

论晚清至三四十年代的儿童科学文艺

杜传坤

(山东师范大学, 山东 济南 250014)

[摘要] 晚清的儿童科学文艺处于萌芽期,以科学(幻想)小说译介为主,目的在于改造中国人的梦;五四崇尚科学与儿童本位,儿童科学文艺却陷入相对的沉寂期;三四十年代这一文学类型焕发出新的生机,以科学小品为主的科普类被用于应对现实危机。本文突破以往对晚清和三四十年代的“隔断式”研究,打通三个时期的时空闭锁,从而揭示其完整演变轨迹;同时打破学界对五四儿童科学文艺保持的沉默,对其文本和理论进行初步的钩沉梳理,从前人忽略的“空白”中解读出丰富的意义。对不同时期儿童科学文艺的本质特点、内外根源及各时期之间运演规律的探究是本文的重心所在。

[关键词] 儿童文学; 儿童科学文艺; 科幻到科普; 梦想到现实

[中图分类号] I206.6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3-4145(2005)05-0082-04

晚清:改造中国人的梦

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使西学东渐之风日盛,“实学”、“格致”一时成为显学,初期译介西方科学教科书、普及读物通过各种报刊介绍科学知识,基本属于科普的初级阶段。逮至小说界革命,大量域外小说涌入华土,其中便有科学文艺一类。晚清科学文艺以科学小说为主,而科学小说又以法国儒勒·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为代表,因当时文体意识淡薄,均以科学小说统称,本文亦沿用此名称。自1900年到民国前夕,凡尔纳小说的中译本近二十种(不计重版),甚至出现了“一本多译”的现象。晚清文坛涌现出一股“凡尔纳热”。

晚清的绝大多数科学小说并非专为儿童译介或创作,通常只是有意无意地“兼及”儿童。比如,1900年逸儒译、秀玉笔记的《八十日环游记·序》中,谈到此书“非若寻常小说,仅作海盗海淫语也,故欧人盛称之,演于梨园,收诸蒙学,允为雅俗共赏。”^[1]其中,“收诸蒙学”只是此类小说的效果之一,不是译介的全部目的。鲁迅《〈月界旅行〉辨言》中提到的“贩夫稚子”、“纤儿俗子”,也只是用来说明科学小说通俗性趣味性的优越之处,并非将稚子纤儿作为主要的阅读者。徐念慈翻译的《黑行星》,虽然采用了口语化的白话表达,与他自己倡导的儿童小说“其文字,则用浅近之官话”的原则相符,但也不能由此证明是专给儿童看的。儿童意识比较明显的也有,如梁启超译的《十五小豪杰》。此书上署“少年中国之少年重译”,卷首填了一阙《调寄摸鱼儿》阐明译书目的,最后一句为:“我非妄语,劝年少同胞,听鸡起舞,休把此生误。”^[2]是激励少年人发愤图强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晚清人们心中,小说的儿童读者主要是“少年”,即接近成人的“大龄儿童”,而不是幼童,这一点在当时诸多小说译创目的中皆可以得到证实。这与“儿童的

发现”情况有关,也和晚清的时代危机有关,这些“年少同胞”不久便可由“未来之国民”转变为现实的“国民”,可以参与救亡图存的大业,因此备受瞩目。

晚清以“凡尔纳热”为代表的科学小说译介并非偶然。首先“科学”与“小说”两大因素的结合,迎合了欲借“小说”之形式传“科学”之内容的一代文化先驱的愿望。1902年梁启超在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〈新小说〉》中提到《新小说》准备刊登的“哲理科学小说”是“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”。此处“格致学”即为自然科学,成之在其论文《小说丛话》中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说:“科学小说,此为近年之新产物,借小说以输进科学知识。”^[3]最为人们称道的是鲁迅的《〈月界旅行〉辨言》:“盖胪陈科学,常人厌之,阅不终篇,辄欲睡去,强人所难,势必然矣。惟假小说之能力,被优孟之衣冠,则虽析理谭玄,亦能浸淫脑筋,不生厌倦。”借小说的体裁来传布科学知识显然强于直白陈述科学之理,从而“使读者触目会心,不劳思索,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,获一斑之智识,破遗传之迷信,改良思想,补助文明,势力之伟,有如此者!”因此,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呐喊:“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,导中国人群以进行,必自科学小说始。”^[4]既看到了陈述科学知识的枯燥乏味,又充分认识到了小说形式对读者的吸引力,而且道出了科学小说的社会功用目的。梁启超给少年译的《十五小豪杰》,在书后亦表明译书的“因果”为:“见这本书可以开发本国学生的志趣智识,因此也就把它从头译出。”^[5]

此外,科学小说的“通俗文学”因素也契合了普通民众的阅读趣味。很难想象晚清读者群是为了提高科学素养才去读科学小说,即使获得了科学知识也是于“不知不觉间”得到的副产品。这类小说通常采用通俗文学惯用的写作技法,通俗易懂且情节有趣,所以能被一般大众甚至

收稿日期:2004-12-01

作者简介:杜传坤,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在读博士生。

少年学生阅读。包天笑在《铁世界》译余赘言中说：“世有不喜学科书，而末有不喜科学小说者，则其输入文明思想，最为敏捷，且其种因获果。”^[6]这就是科学小说优于普通“学科书”的地方——读者喜欢读。1903年，海天独啸子译日本科幻小说《空中飞艇》，下卷预告中言：“以科学之至理，出之于小说之笔墨，复含以浪漫之趣味，其理想之事，事实之奇，结构之美，文词之工，有令人不可思议者。”^[7]基本道出了科学小说的魅力所在。而在此之前，“上中二卷读者早已欢迎”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尤为可贵的是，科学小说对传统小说亦有技法上的超越。就象鲁迅译《月界旅行》时所发现的：“至小说家积习，多借女性之魔力，以增读者之美感，此书独借三雄，自成组织，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，而仍光怪陆离，不感寂寞，尤为超俗。”^[4]这种新鲜的审美体验是旧小说所没有的，而且“光怪陆离”较之于“女性之魔力”无疑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

译介同时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独创科学小说，明显具有“利用科学”的嫌疑。作者一般是把“小说”放在第一位，而对精确的“科学之至理”则不怎么较真。如《新纪元》作者在第一回中所言：“看官，要晓得编小说的，并不是科学的专家；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。”^[8]明显的重小说轻科学。时人虽推崇被誉为“科学家中的文学家，文学家中的科学家”的凡尔纳，却很少有人能把科学与文学集于自身，或者没兴趣或者没能力。但科学修养的不足并没过多影响科学小说创作的信心。其中因缘也许正如陈平原指出的：“世纪初的科学小说家，不满足于讲述‘求知’或‘探险’的故事，而是努力渲染其‘高尚之（政治）理想’，并由此造成中国科学小说的发展方向‘没有纯粹的求知欲望，有的只是如何利用‘科学’，达到某种或高尚或不高尚的政治目的。’”^[8]

世纪初，鲁迅留学日本时读了凡尔纳的小说，发现中西方知识分子的梦想有天壤之别，前者是金榜题名、升官发财、封妻荫子，后者却是海底两万里、环游地球、远征月球。因此，鲁迅喊出了：“要改造中国人，必须先改造中国人的梦”。^[9]这也代表了一代思想先驱的启蒙追求，开启民智更新民德，把国人“向后看”的思维模式变为“向前看”，改造国民劣根性“新民”、“立人”从而最终达到救民族国家于危亡的目的。鲁迅后来提到《昆虫记》时还说过：“但究竟是夷人可恶，偏要讲什么科学。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，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。”^[10]晚清的科学小说正是文化旗手们“改造中国人的梦”的一种尝试。儿童作为当时的“准国民”，也受到了这种科学文艺体裁的恩泽，大开了眼界，第一次领略到科学的神奇及此种小说的巨大魅力，为儿童科学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最初基础。

儿童科学文艺的真正兴起，是在三十年代之后，下面先论述这一时期，最后谈五四。

三四十年代：以“科学常识”应对现实

“自民国二十年沈阳事变，接着二十一年淞沪抗日血战以后，全国朝野都有一致的呼声：‘科学救国！’‘迎头赶上！’文学是时代的反映；而儿童读物的转变到注重科学常识，一半也由时代的浪潮冲激的罢。”^[11]不管是“科学下

嫁”、“科学大众化运动”，还是通俗文艺运动及“新生活运动”，用通俗浅显的文艺形式向大众普及科学常识成为全社会一致的要求。就这样，儿童文学从晚清的科学“幻想”和五四的童话“梦想”一脚踏进了“科学常识”的“现实”。

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试验国文题的作文试题是：“艺术与人生”或“科学与人生”，二者选做一题。这颇具象征意味，透露出文学由“艺术”向“科学”位移的历史倾向。但是“此科学”已非“彼科学”，不同于晚清科学小说中属于“未来”的知识。此时期关注的是“现在”的科普常识。老舍写于1932年并于次年出版的《猫城记》，颇具凡尔纳的科幻色彩，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，但当时的受关注程度却远逊于他的《骆驼祥子》等现实主义作品。原因或许在于，这种幻想式的科学与现实离得太远，远水不解近渴。今日的世界已不再容许人们（包括儿童）“做梦”，也不是把一种梦改造为另一种梦，而是放弃梦想面对现实应对现实。相应地，世纪初的“凡尔纳热”被“法布尔热”、“伊林热”所取代。30年代前半期，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、《化学奇谈》，苏联伊林的《五年计划的故事》、《几点钟》、《黑白》、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等科普作品被大量引进，译介热潮也牵引着模仿和创作大潮的高涨。

除了上述时代原因外，科学文艺的勃兴还和教育观的转变有关。“教育由于‘注入式’转变到‘自学辅导’与‘教学做合一’的时候，教育实在是明白地说：一切的教育当以‘做’为中心，而是‘实验的教育’了。科学是实验的东西，高深的科学论文于儿童是无能为力的，科学童话替代它负责，实在是应需要与潮流而产生，不是偶然的。”^[12]

以上皆是从儿童之外而非儿童自身的角度提倡儿童科学文艺，矛盾填补了这一空白。1933年他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连续发表5篇“儿童读物自由谈”系列论文，呼吁为高年级儿童创作历史的科学的文艺读物。理由是：儿童的求知欲好奇心随着年龄而发展，十一二岁的儿童“对于宇宙万象和新奇事物都要求合理的科学的解释。他们不再相信神话中的事物起源的故事，他们扭住了母亲，要她说真话了！”^[13]这完全是从儿童的年龄特征出发，阐明“大孩子”对于儿童文艺的特殊要求。从儿童的兴趣和水平考虑，进一步提出了此类题材在形式上的特殊要求，把历史的、科学的内容与文艺的形式结合起来，使用文艺气味浓厚的故事体，从而使儿童科学文艺真正成为儿童的读物。

在救亡、教育、儿童需要等多方因素的促发下，儿童科学文艺渐渐走向实践层面。除了翻译法布尔、伊林等人的科普作品外，陶行知于1933年邀请高士其、董纯才等数人在上海创办儿童通讯学校，编写了108册儿童科学丛书。同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500种的《小学生文库》，科学文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1934年陈望道主编的《太白》半月刊创刊，辟有“科学小品”专栏，借小品文形式宣传科学、普及知识。一时间《中学生》、《新少年》、《妇女生活》等众多杂志纷纷刊登科学小品，还有不少结集出版的，其中有许多是适合儿童阅读的，科学小品很快成为儿童科学文艺的主要体裁。

最初几年基本是学习探索阶段，艺术上较粗糙。茅盾

1935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现在我们所有的‘科学的儿童读物’大半太不注意‘文艺化’，叙述的文字太干燥，甚至‘半文半白’，儿童读了会被催眠。”^[14]此前鲁迅曾批评过当时《中学生》杂志上的一篇《动物的本能》，这篇教青年以生物学知识的文章，显然有意模仿《昆虫记》的写法，不料功夫不到家走了形。文中写鸟粪蜘蛛是故意装作鸟粪模样欺骗小虫，还有蜘蛛和螳螂等昆虫“蚕食自己亲丈夫”等，鲁迅批评其“未免太说了‘人话’”，^[15]不顾生物本性而硬以人类的“五伦”去解释。后来陈伯吹谈到这一时期的儿童读物时也提到：“问题在于文学的写作技巧，是否能够消化硬性的科学常识，使灌输知识如传达印象一般的为读者所喜爱而容易接受。”^[11]此阶段翻译、模仿外国作家的风气中，学习苏联的倾向越来越明显，伊林因其作品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备受左翼作家青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做到了“用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世界”、“把科学素材同诗意地感受世界结合在一起”^[16]；他甚至提出“纯科学文艺”（文学与科学完美结合）的概念以区别于一般的科普读物（文学性差）。可以说“伊林热”的起因在于其普及式的科学内容、高超的文学形式和先进的政治思想，这三点对我们的科学文艺影响极大，但当时能达到他那种艺术水准的作品并不多。

1935年之后，我们的儿童科学文艺渐渐成熟，代表人物有董纯才、高士其、顾均正、贾祖璋、周建人等，以科学小品为主。如高士其《我们的抗敌英雄》、《细菌与人》、贾祖璋的《生物素描》、董纯才的《动物漫话》、顾均正的《科学趣味》等诸多小品集均在1936年前后出版，儿童与成人都很喜欢读。这些艺术较成熟的小品文，不但能以较好的文学形式达到普及科学的目的，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思想传达意识。“我写这些科学小品的目的，是以抗战救亡为主题：一方面，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；一方面唤起民众，保卫祖国，保卫民族。同时，它也像把匕首，刺向敌人的心脏，给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揭露、打击和嘲讽”。^[17]高士其的这段话颇有代表性，科学性、文艺性和思想性“三性”合一是当时科学小品的通行标准，颇具伊林的特色，这可以说是对时代救亡主题的一种应答。

董纯才的科学童话是本阶段儿童科学文艺的重大收获。它于1937年创作的《凤蝶外传》和《狐狸夫妇历险记》，是我国科学童话的奠基之作，堪称儿童科学文艺中的翘楚，标志着这一体裁在艺术上的成熟。

如果说晚清是科学与文学互相选择，那么三四十年代则主要是科学选择文学，科学文艺的兴起主要不是从文学角度提倡的，而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把文学作为科学的工具、外套。晚清文化先驱科学普及愿望未能实现的原因之一便在于，他们选择的科学（幻想）小说体裁其实并不适于普及科学常识，而主要是给予人们一种科学的新奇刺激，产生对未来科技社会的向往与追求，同时于对比中批判落后黑暗的社会现实，主要是“梦”的改造。三十年代才确实走上了科学普及的道路，这一重任主要由科学小品担当。总之，三四十年代未发扬晚清的科幻传统，却继承了科普的理想，并切实将其贯彻到具体的译创实践中。

儿童科学文艺在晚清民初萌发的一点嫩芽，于五四期间却未继续成长，相对进入了一个“沉默期”，以往的研究者对这个时期亦是保持沉默。其实这片“空白”中隐含着文学史的诸多意义。

其实五四科学文艺并非“空白”。当时的许多新文化期刊、杂志都很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。《晨报副刊》前期就发表了大量译著文章介绍科学知识，中国留美学生团体“科学社”的机关刊物《科学》杂志更为突出，它在《例言》中曾指出：本杂志“虽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，然以吾国科学程度方在萌芽，亦不敢过求高深，致解人难索，每一题目皆源本卑近，详细解释，使读者由浅入深，渐得科学上智识”。^[19]其化“高深”为浅显易懂的追求显然是一种科普的目的。尤为可贵的事《科学》上还发表了国人自己创作的科学故事。1922年董时雨用通俗的白话创作了一些“适用于儿童之科学故事”，如《六个人》、《蚂蚁造城》、《无数的子孙》、《动物底年纪》、《棉花》、《纸》、《羊毛》等。这些科学故事是五四时期极为珍贵的儿童科学文艺作品，虽然不是以给予儿童“文学”为目的，而主要是为儿童将来“受科学教育”做准备，有着浓厚的科学功利色彩，但客观上毕竟是实实在在的儿童文学——儿童科学文艺。

陈衡哲的《小雨点》作为“小说”发表于1920年《新青年》8卷1期，实则一篇拟人体的科学童话，趣味性 with 知识性水乳交融，是“第一篇真正可以称为白话创作的现代文学童话”（金燕玉语），后来还被收入初中的国语教科书。虽然并非自觉为儿童创作的，但堪称早期儿童科学文艺的佳作。

郑振铎1922年创办的《儿童世界》周刊，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两份儿童刊物之一。它在《宣言》^[20]中列举了十类拟刊载内容，其一为：插图——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照片，加以说明，使儿童得点博物学上的知识；其四为：故事——包括科学故事，冒险故事，及神仙故事。后者虽主要是“重述”外国作品而非创作，但毕竟在儿童文学中给了科学文艺一席之地。

1925年鲁迅在文中呼吁：“单为在校的青年计，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，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，要浅显而且有趣的。”^[21]

同年，周作人为李小峰译的科学童话《两条腿》作序，认为要把科学上枯燥的事实讲成鲜甜的故事并非易事，“《两条腿》乃是这科学童话中的一种佳作，不但是讲得好，便是材料也很有戏剧的趣味与教育的价值。”^[22]这篇讲人类生活变迁的动物童话弥补了学校教科书的不足，周氏认为《人与自然》之类是“记录的文章，适于高小的生徒，在更幼小的却以故事为适宜。《两条腿》可以说是这种科学童话之一。”^[22]有的研究者以周作人那篇《沟沿通信之三》为证，说他反对（儿童）科学小说维护童话，这种说法不无道理，但不能因此就说他反对儿童科学文艺，科学小说只是科学文艺中的一种体裁。上面的“序”就是一个证明，他很鼓励这种故事体的儿童科学文艺。

以上的“拾遗”或者“钩沉”，只能证明五四儿童科学文

艺的理论与译创并不是“空白”，但与晚清和三十年代相比，仍无法改变其相对沉寂的事实。究其原因，笔者以为有如下几方面：

首先，五四发现的儿童主要是“幼儿”（大约3~10岁），其儿童文学主要是指“小学校里的文学”。周作人在其著名论文《儿童的文学》中指出：“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，他相信草木能思想，猫狗能说话，正是当然的事；我们要纠正他，说草木是植物，猫狗是动物，不会思想或说话，这事不但没有什么益处，反是有害的”；但儿童的生活又是转变的、生长的，因此“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便同他将猫狗说话的故事……等到儿童要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来，我们再可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。”^[23]这种观点很具有普遍性，在当时研究儿童文学的大量论文中均有体现，社会上基本达成了共识：儿童需要的是猫狗说话的“童话”，“科学”是属于“大孩子”和成人的东西。即使上文提到的《科学》杂志，其编者“按语”中也只是说借科学故事引起儿童的科学兴趣，并未要求儿童接受科普知识，而且特别强调其故事性，把“受科学教育”交给了“将来”，这亦可看作当时儿童本位文学理论的影响所及。

其次，创作水平的限制。五四儿童文学是侧重“文学风味”的，而“知识性的儿童读物还停滞在‘叙述式’的时期，文体类同教材，致使未受人们重视。”^[24]艺术技巧的粗糙直接影响这一体裁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发展。鲁迅也表示过类似的不满：“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，有做的，也过于高深，于是就很枯燥。”^[21]当时人们对儿童文学的各种体裁还不能应付自如，再添加硬邦邦的科学知识就更难上加难，即使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一问题仍然存在。

再者，与五四科学思潮的偏向有关。有学者在论及五四的科学呼吁未能带动科幻创作的原因时指出：五四的科学认知朝两个方向发展，一是“科学主义”的泛滥，一是严肃的科学专业研究。前者对科学取无保留的欣赏态度，迷信科学万能说，将“科学”导向改造社会政治一途；后者则是高度专业化的，追求严肃精辟的科学论文与观念，只有专家才能接受，对于科学知能的推广普及并无立即的成效。这两脉的“科学”均无助于科学文艺的创作。^[6]这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五四儿童科学文艺的不发达。

综上所述，三个时期虽然都重视“科学”，皆有“科学救国”的口号，但各期科学文艺中“科学”的含义或指向是不同的。大体看来，儿童科学文艺从晚清历经五四至三四十年代，是从不自觉走向初步的自觉，由笼统的“科幻”走向具体的“科普”，从改造国民“梦想”到救助危亡“现实”。借助这种文学类型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功利意识，始终伴随着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旋律或隐或显。如果说“儿童性”、“科学性”和“文艺性”是构成儿童科学文艺的三要素，而且是筛选和衡量此类作品的三个标准，以此去分析和评价三个时期的作品时就会发现：能兼顾并较好融和这三要素，或达到这三标准的佳作并不太多。中国早期几十年的儿童科学文艺犹如文学史上一道“倾斜的风景”，有成

就亦有太多缺憾；对其后半半个多世纪的儿童科学文艺来说，既提供了经验，也预置了功利的枷锁——总是走不出科普的圈子。

[1][2][5][7] 胡从经著：《晚清儿童文学钩沉》，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，200、204、97页。

[3] 陈平原、夏晓虹编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，62页。

[4] 《〈月界旅行〉辨言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0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，152页。

[9] 参见林健群：《晚清科幻小说研究1904-1911》，台湾国立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。

[8] 陈平原：《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——以“飞车”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中国文化》1996年第13期128页。

[9] 转引自韩松著：《想象力宣言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，124页。

[10] 《春末闲谈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，203页。

[11] 陈伯吹：《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》，《儿童文学论文选集1913-1949》，325、324页。

[12] 陈伯吹：《童话研究》，《儿童文学论文选集1913-1949》，206页。

[13] 茅盾：《论儿童读物》，《儿童文学论文选集1913-1949》，215页。

[14] 茅盾：《关于“儿童文学”》，《儿童文学论文选集1913-1949》，219页。

[15] 《“人话”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，73页。

[16] 转引自《儿童文学教程》，浦漫汀主编，1991年版，147、135页。

[17] 高士其：《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·自序》，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。

[18] 顾均正《和平的梦》序文，引自叶永烈《论科学文艺》，83页。

[19] 参见刘为民：《〈晨报副刊〉与〈科学〉杂志》，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——科学传播——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（第六章）

[20] 郑振铎：《儿童世界·宣言》，《儿童文学论文选集1913-1949》，30页。

[21] 《通讯·二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，25页。

[22] 周作人：《两条腿·序》，钟叔河编《周作人文类编·上下身》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，841、842页。

[23] 周作人：《儿童的文学》，钟叔河编《周作人文类编·上下身》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，684、685页。

[24] 吕伯攸：《儿童读物研究·绪言》，仇重、金近等编著《儿童读物研究》，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。

（责任编辑：李玉明）